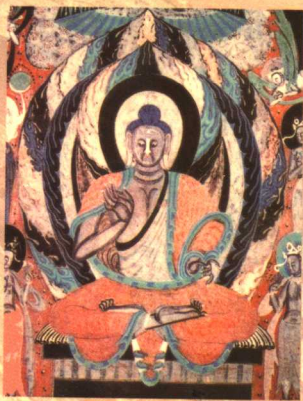


新世紀

敦煌學論集

主編 項楚 鄭阿財



新世紀
敦煌學論集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新世紀敦煌學論集/項楚 鄭阿財主編. —成都: 巴蜀書社, 2003.3
ISBN 7-80659-429-9

I. 新... II. ①項...②鄭... III. 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文集 IV. K870.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2) 第 100992 號

策劃組稿 李 蓓
責任編輯 李 蓓
封面設計 文小牛

新世紀敦煌學論集

項楚 鄭阿財 主編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80×1230

1/32

印張 24.875

字數 680 千

2003 年 3 月第一版

2003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冊

ISBN 7-80659-429-9/K·48

定價:48.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目 錄

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

- 兼談學習潘重規先生在“新亞”演講的體會……………柴劍虹 1
敦煌文獻中混入日本抄本及偽抄本……………(日)石塚晴通 7
入海遺編照眼明
- 潘重規《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題記》讀後 ……榮新江 14
《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
- 以敦煌本爲中心……………鄭阿財 27
略論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陳國燦 49
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新發現的文獻及其學術價值……………彭金章 63
BD14681《尚書》殘卷考辨……………許建平 74
官定正字之外的通行文字
- 從敦煌漢文寫卷看俗字應有之定位……………蔡忠霖 96
唐玄宗《御注金剛般若經》的復原與研究……………(日)衣川賢次 114
《十吉祥》研究……………李 誠 126
上古時期的看圖講誦與變文的起源……………伏俊連 144
王梵志詩之整理與研究……………陳慶浩 朱鳳玉 156
《老子化胡經》卷八的成立時代……………柳存仁 168
敦煌北窟敘利亞文課經(Lechony)詩篇殘葉考釋……………吳其昱 191
敦煌悉曇章與琴曲悉曇章……………饒宗頤 234
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譚論……………王小盾 何仟年 239
敦煌藏經洞發現之民間講唱文藝作品的歷史考察
- 二十一世紀的展望……………朱 雷 258
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日)高田時雄 266
敦煌占婚嫁文書與唐五代的占婚嫁……………黃正建 274
P.4525(8)《官布籍》所見歸義軍政權的賦稅免徵……………劉進寶 294

敦煌吐魯番居民生存權之個案研究	毛漢光	310
唐後期五代宋初中印文化對敦煌寺院的影響	郝春文	331
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	鄭炳林	338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與唐代吐蕃史研究	林冠群	358
關於《淨名經集解關中疏》群	(日)京戶慈光	375
讀敦煌觀音經注——P.3904	劉楚華	385
敦煌寫本《降生禮文》初探	汪娟	399
敦煌本《佛說妙好寶車經》研究	蔡榮婷	429
日本平安古記錄文中的“件”		
——與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公文比較	(日)砂岡和子	453
敦煌禪宗文獻詞語割記	蔣宗福	471
敦煌卷子P.3006詞彙研究	竺家寧	486
校訂敦煌變文資料上的一個建議——“个”的問題	(日)玄幸子	509
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通用量詞探析	洪藝芳	518
讀變隨割	項楚	541
敦煌變文中詈罵及咒誓的探討	羅宗濤	551
讀敦煌變文雜記	金榮華	573
《劉薩訶和尚因緣記》探究	王國良	582
敦煌文獻中齋願文的內容分析研究	王三慶	598
敦煌願文補校	黃征 曾良 洪玉雙	621
由《舜子變》看唐人推行孝道教育的政治措施	謝海平	649
敦煌文獻中之《往五臺山巡禮記》		
——兼談日僧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及日記的起源	董志翹	666
敦煌寫卷所見受道教避穀食氣思想影響的佛典	蕭登福	684
唐、宋敦煌地區的世俗佛教信仰		
——以知識與思想為中心	楊秀清	704
試論敦煌文獻之輯佚價值	林平和	725
敦煌舞蹈壁畫研究	王克芬	745
論敦煌樂譜的節奏解譯	陳應時	757
談吐魯番藍書寫本	林聰明	766
編後記		792

關於俄藏敦煌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幾個問題

——兼談學習潘重規先生在“新亞”演講的體會

柴劍虹

1973年8月8日，為考察俄藏敦煌文獻及《石頭記》抄本，潘重規教授隻身飛赴蘇聯列寧格勒市，克服種種困難，終於邁進蘇聯東方學研究院列寧格勒分院的“敦煌特藏庫”，撰寫了著名的《列寧格勒十日記》，成為我國敦煌學家中親自披閱、抄錄、介紹和研究俄藏敦煌寫本的第一人，為推進世界敦煌學研究作出了巨大貢獻。

今天，由於中俄兩國敦煌學家與出版機構的共同努力，俄藏敦煌寫卷均已攝成縮微膠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影印出版，籠罩聖彼得堡“敦煌特藏庫”的神秘面紗已基本揭開，研究這批文獻的條件得到根本的改善。我們在萬分慶幸俄藏敦煌文獻刊佈的同時，一方面不能忘記潘老的筆路藍縷之功，另一方面也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研究任務尚十分艱鉅。筆者從1983年開始研究當時零星刊佈的俄藏敦煌文獻中的詩詞寫本，撰寫過幾篇文章；1989年秋，我陪孟列夫博士乘火車赴敦煌考察，一路上交談的中心內容便是俄藏敦煌文獻；後來，我又應孟列夫博士之邀，於1991年5月赴列寧格勒用三周時間考察了“敦煌特藏庫”的藏品。於是，我對整理與研究俄藏敦煌寫卷面臨的若干問題有了一些感性認識與切身體會，願不揣淺陋提出來以求方家教正。

第一個問題：俄藏敦煌文獻的來歷依然模糊不清。1963年，孟列夫博士在《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第一冊）的《序言》中說：“這是奧登堡院士1914—1915年間領導的俄國西域考察團帶回來的。該考察團對敦煌石窟做了編目工作，並進行了發掘，中國寫卷藏品，就是這些工作的成果。”1973年，孟氏則對潘重規先生講，俄藏敦煌卷子，是奧登堡考察隊1914—1915年“在敦煌工作”時獲得的。具體從何處獲得？怎麼獲得？他沒有講。1989年孟氏在火車上與我談及此事亦語焉不詳，他當時還極力否

認奧登堡考察隊切割過敦煌壁畫，後來到了敦煌，樊錦詩院長帶他去查看遭奧氏切割的壁畫，孟氏無語。就在八十年代，蘇聯漢學家斯卡契科夫根據未曾公佈的檔案撰文介紹當年奧登堡考察隊在敦煌莫高窟的工作情況，文中提到：“奧登堡考察團在挖掘與清理洞窟垃圾的過程中，除了發現古代藝術品殘片外，還發現了大量的古代寫卷殘卷。奧登堡小心地收集了這些殘片與殘卷。此外，他還成功地從當地民衆之手，搜集到大量散失的殘卷與將近 200 件一定程度上還算完整的寫卷。”由此可見，奧登堡確實在莫高窟進行了發掘，甚至在藏經洞內進行了“挖掘與清理”這正是特別令人驚訝的事。因為這是在他之前的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所無法想像的。儘管清廷已下令在 1910 年將藏經洞“遺珍”運送北京，畢竟洞內還有洪辯塑像、壁畫等文物，豈能讓外國人進去挖掘！衆所周知，1914 年 3 月 24 日，斯坦因二進敦煌莫高窟，又從王道士的手中得到了 570 餘件寫本與絹畫。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圖記》中寫道：“當官府下令運走藏經時，王道士曾設法將一部分他認為特別有價值的漢文寫卷另藏了起來。這批卷子的數量想必也不會太少，後來我再度造訪這一遺址時，還有豐厚的收穫，滿滿地裝走了 5 箱子的漢文經卷，大部分保存完好。爲了獲得這些經卷，捐贈自然也得增加。我懷疑直到現在王道士的小庫房還沒有被取光。”奧登堡考察隊是 1914 年 8 月 20 日到達莫高窟的，比斯坦因二進千佛洞又晚了 5 個月，目前尚無資料證明奧氏一行與王道士有過接觸，大約並未以“捐贈”銀兩的手段來換取王道士私設的“小庫房”裏的敦煌寫本，但“從當地民衆之手”搜集到數百個較爲完整的卷子的可能性卻實在太小。我頗懷疑奧氏利用了當時王道士不在莫高窟的機會，不僅私自進入洞窟發掘殘餘，而且想法攫取了“小庫房”裏的寫卷——即便王道士回來發覺，也是決不敢聲張的。現在有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俄藏敦煌寫本、絹畫絕大多數亦出自藏經洞，不大可能來自別的洞窟。王道士私藏藏經洞寫卷的事實，後來也從土地廟發現經卷（1944 年）而得到旁證。

當然，講奧氏私闖“小庫房”掠取寫卷，我這也僅僅是一種推測，目前尚無實據。1991 年 5 月孟列夫博士陪我參觀愛爾米塔什博物館，在魯多娃博士的工作室，我見到了當年奧登堡考察敦煌千佛洞的六冊筆記。因時間匆忙，祇翻看了其中幾頁。該筆記文字是用打字機打的，並不難整理，卻不知爲什麼一直沒有公佈。當時我就向俄國同行提出應該儘快刊佈。聽

說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將該筆記拍成膠片，正請人翻譯。或許該筆記公佈之日，就是俄藏敦煌卷子的來歷大白於天下之時。澄清這一點，對推進整理與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個問題：“敦煌特藏庫”中摻雜的新疆與黑城收集品的識別、整理工作亟待進行。聖彼得堡的“敦煌特藏庫”中摻雜了不少新疆與黑城（哈喇浩特）的收集品，孟列夫博士在《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第一冊的“序言”中曾這樣說明：“為數不多的一部分寫卷，是奧登堡為首的1909—1910年第一次吐魯番考察團帶回來的。還有部分寫卷，是駐烏魯木齊俄國總領事H.H.克羅特科夫於1909—1910年收集的，以及C.E.馬洛夫的和關考察團帶回，交給該研究所文獻館的。但是，收藏的文獻除少數寫卷以外不登記來源，也沒有另外編號的記載。”這就容易造成混淆。孟氏在編目時，並沒有進行細緻的辨別，將一些非敦煌所出的寫卷或印本統編在Ax號內。其中關於黑城資料的混入，孟氏1973年向潘老解釋說是“當初黑水城資料用箱裝好，存入書庫時，偶有從箱裏跌出，管理人員沒注意，大約有二十件左右放置在敦煌抄本中”。從客觀上講，列城收藏的文物經過二戰的殘酷洗禮，肯定會有一些散亂，能基本完整地保存下來，已屬不易；但另一方面，如孟氏所述這種看似偶爾的疏忽，反映了登錄保管與整理編目工作上的漏洞。《俄藏敦煌漢文寫卷敘錄》中文版的“譯者前言”講“孟錄”中有9號出自黑城，其實不止。據我對該《敘錄》上冊（即第一冊）的粗略統計，明顯出自黑城的就有13個號碼，而且其中有原弗盧格編號的6種，說明早在二戰以前黑城收集品已有混入敦煌資料者。另據我統計，該冊還編入馬洛夫藏品14種、克羅特科夫藏品65種，而注明為“奧登堡珍藏”的數以百計的號碼中，還應包含有奧氏在吐魯番的若干收集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Φ-320號（M.2245）的“緣禾”三年（434）所寫《大雲經》殘卷，顯係高昌出土，因編目者不識“緣禾”年號及“田地”城名（今魯克沁）而錯置。如此看來，僅孟氏兩冊《敘錄》中的非敦煌文獻恐怕就要超過總數的百分之十。據我1991年在列寧格勒調查敦煌與黑城資料時親眼所見，放置在大櫃子裏的這些珍貴卷子祇是分別夾在不太厚的硬紙板裏，有的同一紙夾裏有好幾個碎片，沒有其他的保護及固定手段，取放時不小心便會掉出來；我調閱時已發現有散失者，問孟氏，他也說不出去向。我還瞭解到，俄國藏品的登錄、編號若干年裏多次進行，歷

經多人之手，同一卷子反覆編號、幾個號碼或不同編號的情況並非罕見。在弗盧格編目與孟列夫小組編目之間，從 1954 年到 1956 年逐年都有編目，而且在卷子上作了記錄。我們看《敘錄》上冊所附圖版，就會看到《莊子·漁父篇》寫本有 1954 年的 Дх-178 編號，又有“1021 或 1234”的號碼，《老子道德經》寫本相連接的兩紙編了 Дх-1111 與 Дх-1113 兩個並不相連的號碼，Дх-1356《孔子項託相問書》是 1955 年的編號，如此等等，在俄藏卷子中不勝枚舉。我作調查時，列城東方學研究所雖已對庫藏文獻分人管理，但因研究工作需要，實際上並不嚴格，如黑城資料統由丘古也夫斯基研究員管理，但是其中西夏文材料當然由克恰諾夫博士支配使用，我要調閱敦煌卷子中的詩詞寫本可以找孟氏，而沙知先生要看經濟文書孟氏就無法作主了。許多材料分散在各人之手，並無嚴格的借閱制度，這也是造成卷子混淆的原因之一。現在，隨著俄藏文獻的刊佈，已有學者對編在“敦煌漢文寫卷”中的個別非敦煌文獻作了很好的辨析與研究，如榮新江教授對《敘錄》中 Ф-2296 (M.897)《景德傳燈錄》寫本實為黑城文物的認定（見《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論集》，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1996 年，250—253 頁），但總體來說，這項重要的工作任務還很艱鉅，需要加速進行。最近聽說陳國燦教授已開始對俄藏吐魯番文書進行整理研究，這無疑是極好的消息。

第三個問題：俄藏敦煌寫本的綴合任務艱鉅、意義重大。由於敦煌藏經洞文獻歷經劫難，散失嚴重，寫本的綴合便成為整理、研究工作中一項重要而艱難的課題。敦煌寫本的綴合是各地所藏各類敦煌材料研究中的普遍性課題，從敦煌學初創時期開始就陸續有學者在零星地進行，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於俄藏敦煌文獻是最後流失海外又最晚刊佈的大宗藏品，其中又有數量最多的碎片，因而綴合任務最艱鉅，而意義也格外重大。所謂“綴合”，一是指俄藏殘卷、殘片本身的綴合，這一點俄國學者在整理編目時已做了部分工作，尤其是在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編輯出版《敘錄》時又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我們將《敘錄》的俄文本與中譯本加以對照便可瞭解；二是與其他地方所藏敦煌寫本（或非敦煌寫本）的綴合，這更為重要，因為它們往往能提供特別寶貴的資訊，使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近年來，這方面已有若干成功的例子，如前面提到過的榮新江對俄藏 Ф-2296 (M.897)《景德傳燈錄》寫本的識別及其與英藏黑城

KK.II.0238 (K) 號寫本的綴合，對釐清藏經洞寫本年代有重要價值；又如徐俊、榮新江對俄藏 Дх.3865 與法藏 P.2492 詩文選集寫卷的綴合，糾正了原先將 P.2492 卷定名為“白香山詩集”的誤斷，對認識唐詩流傳有積極意義；再如徐俊比定俄藏 Дх.3871 詩歌殘片與法藏 P.2555 詩文選集殘卷的綴合，使對這個著名寫本的研究進一步深入。應該說，過去我們對俄藏敦煌文獻眾多碎片的重要性認識不足，主要是對它們在寫本綴合上的作用與意義認識不足，對每一個碎片都可能包含著豐富的信息量認識不足。本文談及第一個問題時提到，這些碎片，有許多是奧登堡考察團挖掘、清掃藏經洞所得，由於時間、地點（包括地層）的原因，恐怕與 1910 年運到北京的“劫餘”及 1912 年日本大谷探險隊從敦煌所得殘卷關係更加密切，因此，加強對俄藏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日本公私所藏的比較研究，亦勢在必行。

前面所講俄藏敦煌文獻整理、研究中的三個問題，在敦煌學研究中，既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既是新任務，也是原有課題研究的繼續與深入。新世紀伊始，敦煌學的研究方興未艾，正如季羨林教授近來一再指出的：過去的一個世紀，敦煌學的研究任務恐怕祇完成了一小部分，今後的工作更艱鉅。《列寧格勒十日記》中，附錄了潘老 1972 年 12 月 16 日在新亞研究所的學術演講。對敦煌學“未來的發展”，潘先生提出了三個具體工作：“第一，我們應該聯合國際學術界的力量來編纂一部敦煌遺書總目錄；第二，我們應該聯合國際學術界的力量，來編纂一部敦煌論文著述總目錄；第三，我們現在應該成立一個研究資料中心，做好敦煌寫本攝影、臨摹、楷寫的工作。”潘老又提出了敦煌研究的兩項原則或兩種精神：敦煌學中國化與敦煌學現代化。我體會，潘老提出的具體工作任務與原則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雖是三十年前所講，卻帶有劃時代的意義，應該成為新世紀全世界敦煌學研究者的指導方針。敦煌學是“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在國外學者那裏，它不是純粹的“西學”，而是西漸之東學，是國際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學人這裏，它也不是傳統的“國學”，而是包含了諸多東漸之西學內容。因此，必須強調國際間的交流、合作，纔能向現代化方向前進。例如，編寫一部完整的敦煌遺書總目（包括漢文文獻與所有非漢文材料），沒有國際的合作是很難“畢其功於一役”的。目前，雖有各種目錄編寫出來或正在編寫之中，但由於各國、各地的藏品調查工作還遠未完成，所以哪一種編目都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總目”。敦煌學的

現代化，當然也包括保護文物與研究必須運用日益發展的先進科技手段與方法，這同樣需要國際間的合作與借鑒。我最近特別強調“實質性的具體項目的合作”，正是基於這種合作的緊迫性、可行性與有效性。另外，敦煌文獻與藝術，首先是中國人的文化遺產，是中華各民族文化的組成部分，我們兩岸的中國學者不但有更大的責任來保護、研究它，而且應該主要立足於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來研究它，使之推陳出新、發揚光大。這纔是敦煌學中國化的真正含義。近幾年來，有不少學者呼籲敦煌學要“回歸”歷史學、文學、語言學、藝術學、宗教學等等，恐怕也是基於“中國化”與“科學化”的考慮。潘重規先生卓越的研究成就告訴我們，在社會日益進步、文化科技日益發展的今天，中國化與國際化、傳統文明與現代化都是應該也可以做到和諧統一的，關鍵是在於我們的努力。

作者服務單位：臺灣敦煌研究院

敦煌文獻中混入日本抄本及偽抄本

(日) 石塚晴通

一

敦煌文獻被發現以來已經經過了一百年，最近各地所藏的敦煌文獻照片複製品紛紛面世，特別是中國各地，這是一件大喜事。但是這些文獻中混有不少日本抄本及偽抄本，作為參考資料時，要特別注意。

高山寺等地的日本寺院的資料都蓋有藏書印，光明皇后五月一日經等通過其有沒有公文就可以一眼看出是不是日本抄本。現在所藏的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藏書印及公文印，辨別影印本有不少困難。在敦煌文獻還沒被人們認識以前，日本的古抄本作為僅有的珍重的中國抄本流入中國，在大量的敦煌文獻出現以後日本奈良、平安時代（八世紀到十二世紀）的抄本流入中國，並作為敦煌文獻保存起來。本人判斷日本抄本有以下三個主要基準。

1. 書體、字體和中國的標準不同。
2. 使用的紙應該是日本製造的。
3. 日本的訓讀都加有點。

偽抄本有兩種，第一種是二十世紀初期在敦煌周圍製作，各國探險隊購買並收集的，另外一種是在天津、中國內地製作的。前者已經於 1997 年 6 月在大英圖書館召開的 Workshop “Forger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的會上有了答案。俄國的 Oldenburg 探險隊、日本的大谷探險隊、英國的 Stein 第三次探險隊在明知收集的文獻中有許多偽抄本的情況下，仍在不斷的收集敦煌文獻，並為此煩惱。事實上從現在收藏的展出的文獻中調查，會發現有不少偽抄本。把原本放在複製品旁邊並沒有感到惡意，作為資料用要注意，因為它畢竟是二手材料。在天津製作的問題更大，為了提高商品價值，在複製的文獻中記入年號、寫上珍奇的文句，這些複製品連作資料都不可以。複製品大多數做得都很粗糙，

但是，其中也有複製得很巧妙的，特別是照片複印品判斷起來就更困難。判斷偽抄本有以下的標準。

1.紙和敦煌文獻的標準不一樣。

紙的尺寸、紙漉簾的材料、染紙的特點，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標準。

2.使用的筆和敦煌文獻的標準不一樣。

毛筆、葦筆、木筆。即使是毛筆，各個時代和各個地區也有不同的標準。

3.字體和敦煌文獻的標準不一樣。

根據字體的數據表明，各年代、各地區的標準都很明顯。

4.加點的位置不對。

關於敦煌文獻加點的研究，請參考（墨美 201—蘭樓、敦煌的加點本）1997 年以後的文章。

今天，我要講的是在天津中國內地複製的偽抄本的背後有比較複雜的背景，僅舉張廣建為例。

二

幻燈 OHP 說明：

1.高山寺藏重書 4 彌勒上生經 738 寫“高山寺”朱印

“高山寺”、“方便智院”、“十無書院”、“梅尾山善財院”、“梅尾山地藏院”、“報恩院”有朱印的都是高山寺的舊藏書。主要是楊守敬帶來的。

2.敦研附 07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十一世紀後半期，日本寫經已經沒有公文、經藏印，是書誌式的日本寫經。

3.浙敦 064（浙博 039）大般若經卷第六十七 八世紀初期日本寫經
光緒壬寅年即 1902 年，毛筆大般若經敦煌文獻幾乎沒有（P.2114）。

我看將來日本初唐時期唐寫本和八世紀初期日本寫經很難辨別，使用的紙是日本的。（因為裱有中國裝潢所以不能正確的判定。）中國收集出的敦煌文獻毛筆大般若經多數是日本抄本。

4.S6776（Stein III）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偽抄本（敦煌複製），字

體混雜，黃染不合格等判明是敦煌複製品。

5. 三井文庫 025-014-002 華嚴經卷第四十六 偽抄本（天津複製），張廣建收藏。

513 雖然有公文，但書體、字體和延昌期的標準不同、紙的顏色不自然（不是故麻布紙）等，可以判定是天津複製的偽抄本。大概是 1920-1924 年在天津複製的吧。

6. 三井文庫 025-010-039 淨名經集解關中疏卷第二 偽抄本（天津複製），張廣建收藏。

使用的紙是近代的紙，朱點也是近代的朱點，根據這些特點斷定是天津複製的贗品。大概是 1920-1924 年在天津製作的吧。

三

最近，榮新江教授嚴厲地指出在 Stein 以前就有敦煌文獻的存在。張廣建收藏的是王道士在 Stein 來訪以前送給滿人道台廷棟的，1917 年，廷棟被殺後他的財物被沒收，周炳南送給張廣建的敦煌文獻，現在在三井文庫，榮新江在他的書中曾說到（榮新江《敦煌藏經洞文物的流散》，見《敦煌文獻論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但是要把三井文庫收藏的 112 件敦煌文獻都查一遍不是簡單的事情，窺視一下，可知背後複雜的背景。的確，其中有 30 多件，包括唐宮廷寫經和初唐寫經的優製品，這些都是敦煌文獻真品。日本收集的敦煌文獻都是優製品，但是，半數以上是贗品，這些都不是從廷棟那兒來的。是 1928 年由田中三郎作中介，三井家購入的。這些也像張廣建收藏本一樣，背後有複雜的情況。如上所述的宮廷寫經等優製品，沒有張廣建的印。剛纔所看的，可以說明這些贗品都巧妙地蓋有張廣建的印，而且這些贗品還於 1924 年在北京召開的“江西賑災書畫展覽會”上被展出，他本人有沒有參與複製敦煌文獻還不太清楚，但有他的朱印的精巧的贗品確是事實。

還有，大正藏《昭和法寶總目錄》所收藏的，是新町三井家的敦煌本，沒有收藏今井町三井家的。112 件中含有報告書，以赤尾榮慶為代表的科學研究報告書將於 2003 年 3 月出版。

佛觀於善薩主善薩也經

高僧傳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介時世尊於初夜分舉身放光其光金色蓮
祇陀園周遍七所照須達舍亦作金色有金
色光猶如霞雲遍舍衛國處處皆兩金色蓮
華其光明中有無量百千諸大化佛皆唱是
言今於此中有千善薩取初成佛名拘留孫
最後成佛名曰樓至說是語已尊者阿若憍
陳如即從禪起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尊者
者摩訶迦葉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尊者
大目犍連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尊者舍
利弗與其眷屬二百五十人俱摩訶波闍波
提比丘尼與其眷屬千比丘尼俱須達長者
與三千優婆塞俱毗舍法母與二千優婆塞
俱沒有善薩摩訶薩名跋陀羅與其眷屬
十六善薩俱文殊師利法王子與其眷屬五
百善薩俱天龍夜叉乾闥婆等一切大眾歡
佛光明皆悉雲集

介時世尊出廣長舌相放千光明一一光明

如是或爾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
 大比丘眾八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
 盡無復煩惱遠得已利盡諸有結心得自在
 其名阿云橋康如薄訶迦華優婆塞踰迦
 素伽耶迦婆提迦素舍利弗大目犍連賢
 訶迦旃延阿菴祿劫伽富那憍果達提鐵志
 多單度伽婆羅摩拘羅摩訶拘羅羅難陀
 毘羅難陀富樓那族多耶摩子須菩提阿蘇
 囉那須如是眾所知誠大阿羅漢皆獲阿耨
 多羅三三摩訶三摩訶提提社五正覺眷屬
 六千人俱羅羅摩呼耶輸陀羅毗止尸亦熱
 眷屬俱善履摩訶羅八千人皆大阿羅漢
 三不退三菩提不退轉皆得應獲摩訶三菩提
 轉不退轉法如無量壽五百七十七佛於諸佛
 不沮毀德奉事為善供之所歸故以善備身
 善入佛菩薩道大人智辯才或摩訶海音明無
 量世界諸度無量百千眾生其名曰文殊師
 利菩薩翻世音菩薩摩訶大智菩薩摩訶蓮華
 薩不怛風菩薩寶掌菩薩摩訶王菩薩摩訶
 薩寶月菩薩月光菩薩滿月菩薩太子菩薩
 無量力士菩薩越三界菩薩毗盧雜菩薩
 勤菩薩寶轉菩薩導師菩薩如是等菩薩摩
 訶薩八千人俱今時摩竭國因明其數為二
 万天子俱獲有名月天子善喜天子善光天
 子四大天王頭其眷屬万天子俱自在天子
 大自在天子與其眷屬二万天子俱安樂世
 界主梵天王尸棄大梵光明大梵摩訶摩
 屬万二十天子俱有八龍王龍王龍王龍王
 龍王龍王龍王龍王和修吉龍王總又總龍
 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訶龍王優鉢羅龍
 王摩訶龍王千五百十眷屬俱有四緊那羅
 法緊那羅王妙法緊那羅王天注緊那羅王

亦无散失舍利子身界非我亦无散失觸界
 身識界及身觸界觸為礙所生諸受非我亦
 无散失舍利子意界非我亦无散失法界意
 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非我亦无
 散失舍利子地界非我亦无散失水火風空
 識界非我亦无散失舍利子若聖諦非我亦
 无散失集滅道聖諦非我亦无散失舍利子
 既明非我亦无散失行談名色六處觸受變
 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非我亦无散失舍
 利子内空非我亦无散失外空内外空空空
 大空勝義空有為空无為空畢竟空无際空
 散空无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
 法空不可得空无住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
 非我亦无散失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六十七

浙敦 064 (浙博 03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六十七·初分無所得品 (29-26)

傳教大師 最澄

任卷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第六十七水台紙墨字

十八枚總一卷全部

真蹟無疑者也

三月 古筆 仲

山陰湛懷堂錢氏所藏

己丑古欵黃賓虹觀于武林

詩年公年有六開

己丑春日淮陰陳錫伯伯南浦觀于西冷廬居
石呈桂時年七十

光緒壬寅歲暮即錢唐唐啟堂觀於孩中